再探维护祖国统一之道（一）

芦笛

一、欧洲的启示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不必合，合久不必分，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就在共产帝国纷纷崩解、甚至演出同室操戈、兄弟阋墙悲剧的同时，欧洲各国却组成了个什么“欧盟”。到过欧洲的人都知道，凡是入了那个贼夥的成员国公民，不但可以自由前往其他成员国家旅游，连签证都不要，而且可以随便就业，根本就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不但如此，人家还在那商量使用统一货币。如果这最终成了现实，则开在那些国家的外汇兑换局从此只有倒闭的份儿，而旅游者也再用不着孝敬那些兑换商大爷们了。

按理说，这种截然相反的鲜明对照，应该让我们琢磨出个吸取教训、借以改善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的正确方针来。可惜无论朝野，吸取的“教训”却只能让人哭笑不得。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美帝阴谋论”，据说，是万恶的美帝“肢解”了苏东那些主权国家。第二是“民主亡国论”。这两个理论合在一起，便成了“美帝民主阴谋亡国论”，也就是说，“民主”不过是美国人发明的一种类似原子弹的战略武器，谁要是挨上了它，则国家立刻崩溃。如同广岛长崎一样，躺在废墟里的苏联东欧帝国默默地控诉着这“精神原子弹”的罪恶。

世上再荒谬的理论，里面仍然可以有点滴真理。这“美帝阴谋论”未免太夸大了美国人的神通，违反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要说老美有什么阴谋则未必，“阳谋”倒是有的，那就是当年尼克松副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在著名的“厨房辩论”中打的赌兑现了：苏联和东欧人民选择了美国生活方式。在“和平竞赛”中，共产主义世界输给了资本主义主义世界。

比起“美帝阴谋论”来，“民主亡国论”含有的真理更多，更富于启示。准确地说，它应该是“激进民主亡国论”。那就是说，在本国没有民主土壤，国民对民主毫无认识，从未在微观上实践过民主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就在一个古老的专制国家骤然实行民主国家制度，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立刻四分五裂。苏联东欧出现的事，其实不过是辛亥革命的重演罢了。

大概就是因为这两个理论含有表观上的说服力，所以它们哄信了国内大部份人民。因此，这正确的应对措施当然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反美，抵制民主，强化国家“主权”，用暴力去无情镇压一切分离主义理论和实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连某些所谓“民运人士”也跟着共党重复这“主权”论，刘国凯先生最近留在《海纳百川·罕见奇谈》论坛上的大作就最生动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

奇怪的是这些人迷信“主权”的同时，却会忘了欧盟的例子。欧盟成员国虽然都是独立国家，但彼此间的经济纽带非常紧密，成员国各民族的关系的亲密程度更得让我们这个统一国家垂涎三尺：我在欧洲的时候，还从来没看到德国人歧视法国或英国人，反之亦然，更别说那些辱骂其他民族是“猪”是“狗”是“奴”的辉煌文彩。

最主要的是，如今在中国走俏、红极一时的“民族主义”本是欧洲的土特产，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和实践整个是从那块土地上诞生的，咱们不过是拾人唾余罢了。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国际战争，恐怕加起来也没有欧洲多。可如今就是这民族主义祖师爷捐弃前嫌走到了一起。这变化完全是自发的，不但没有个“欧盟联邦军”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平叛”、“镇暴”，而且您要想退盟随时请便。有趣的是不但没人退，争着想进又进不去的国家还嘟嘟囔囔咒天骂地，说谁谁那穷鬼都给批准入了农会，我这富农怎么反倒不获批准？

说起来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住在美国的那些“主权”论者们只记得南北战争，却忘记了或是不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洲要加入合众国先得申请，批准了才能成为那“主权国家”一员。这其实和欧盟也差不多，区别只在于结构的紧密程度不同罢了。这最重要的共同点是“自愿加盟”。

能看到这点的人，立刻就能明白西欧之路和东欧之路的本质差别。东欧共党帝国的形成和维持靠的是两条，一曰欺骗，二曰强迫。所谓欺骗，就是将共产主义这个弥天大谎奉为国教，以此为各民族提供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作为帝国内部的软性粘合剂，而所谓强迫就是“主权”，或曰枪杆子，它成了从外部强行箍住帝国的钢箍。这种维持办法当然有效，问题是，世界不是共党一家的世界，外面还有个参照系统。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就有鉴别”，人民在反复比较之后，迟早要鉴别出那神圣国教不过是一堆谎言。内部粘合剂给冲蚀了，外部的钢箍就迟早要被那离心力崩断。这就是东欧帝国发生过的事，而这也就是将要在中国发生的事。

那为什么西欧人民和美国人民又会自愿加盟呢？原因同样很简单：人不为利，谁肯早起？合在一起有好处，当然就愿意往一块挤。要和美国日本竞争，一个统一的欧洲当然比一个分裂的欧洲有实力。这说到底就是欧盟诞生的初始原因。

虽然逐利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但并不是唯一动机。例如，现在外蒙经济不如中国的平均水平，如果“回归”中国，不用说可以凭空获得大量金钱资助，而且还能让那内陆国家取得出海口。可人家根本就不愿和你这“富农”挤一起。为什么？这里没有自由和尊严！就凭“民运”领袖带头污蔑少数民族兄弟是“外族”这一条，凡有起码自我尊严的人都不会和咱们打堆，更不用说还得效法勃兰特，跪下来为七八百年前的“纳粹”祖宗干的事向咱们悔罪道歉！

这也是苏联帝国崩解的原因之一。其实作为统一国家，独联体在经济上的收益更大，起码落后共和国如哈萨克、吉尔吉斯、阿塞拜疆可以得到财政资助和科技支持，可人家还是独立出去了。

因此，看来要维持国家的统一，唯一的正道是在充份保证各兄弟民族的自由和尊严的前提下，形成经济上的强有力的纽带，使各民族地区心甘情愿地呆在这个大家庭里。舍此不由，却去讲什么“国家主权”、“领土神圣”之类的屁话，只会给人家留下一种恃强凌弱的感觉，逼着人家一有机会马上就独立出去。试问谁是天生的贱民，喜欢听您那“外族”、“猪狗”、“畜生”、“奴才”的“爱称”？

所以，在我看来，要维持国家统一，起码要做三件事：第一，全民建立“真爱国就必须爱少数民族”的共识，让人家享受应有的尊严，心情舒畅地留下来。第二，对国家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将少数民族的自由逐渐还给人家，实施真正的民族自治。第三，发展经济，形成民族

地区和内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强大经济纽带。

这其实也是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下文分别讨论西藏、新疆这两个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以及关注的焦点台湾。虽然台湾并不是民族地区，但处理策略在我看来是一样的，所以本文一块讨论之。

就民族问题敬答 whopper_junior 先生

芦笛

先生说："在下出(初)来乍到，绝对无意向老芦挑战。"老芦何幸，能蒙先生如此"挑战"! 如果网民都像先生这种"挑战"法，则中文网河清有日，民族成熟有望。一个本是供人讨论的地方被化作咳吐大赛场，随便哪个洁身自好之士恐怕都要鹰扬。恕我不客气地说一句，眼下以那兰性德先生为一方，众多汉族网友为另一方的争论，似乎没有多少意思，因为那些历史烂帐再刨下去，只会刨出仇恨来，丝毫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whopper_junior 先生在此无聊喧闹中高标独调，令人钦服。

我得承认，无论是对西藏问题还是对其他民族地区问题，我都是个彻底的门外汉。写那篇文章的目的是抛砖引玉，为大家提供一条新思路，请大家讨论可行性而已。如今欣见先生回应，这番心血毕竟没有白费，在此谢谢先生。我的回答肯定是破绽百出，请大家指正，但我不一定再作回答。最近比较忙，心情也不太好，实在不想再谈政治了。这一点还请草虾先生谅解(在此顺便谢谢草虾先生！)。

关于维护祖国的统一问题，我的态度是，其实所谓统一或独立只对君王有意义。只要人民生活幸福，便住在比利时、卢森堡那样的小国里又何妨？但话虽这么说，人还是得尊重现实，而这里有两个最大的现实不能不尊重：第一是汉族普遍的传统的"大一统"观念，这种观念深刻入骨，连我这种明达之士都无法摆脱。如果一国国民不论政治倾向如何，对这个问题都偏执到走火入魔的程度，那么这就是考虑问题时不能不尊重的最基本国情，否则一定会引出大乱子来。第二个现实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和民族间矛盾尖锐复杂之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维持统一，否则立刻就要变成南斯拉夫式的大屠场。正是从这两个基本国情出发，我才主张实行民族和解，维护祖国统一。

中国现在问题最突出的民族地区，在我看来是新疆和西藏。内蒙其实没有多大的独立可能，其他民族地区就更不用说了。两年前我写了几篇文章驳斥自称是金碧辉的么弟的网人，其中说：未来中国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民族独立，但我敢断言决不会出现满族独立。有位满族网友看了此话，上帖质疑，说是如果民族问题处理不好，照样会出现“满独”。那个帖子我没答，不过觉得这话太不现实：满独？上哪儿独去？美国黑人为什么不来个“黑独”？根本就没有个基地么！类似地，像宁夏那种内陆地区，独立的可能性也不大，至少是没有现实基础。所以，最有现实性、也最令人头痛的还是藏与疆。

藏和疆的价值又不同。西藏对中国只有两个价值，第一是精神上的价值，因为占地广大，能满足国人的“地大物博”的廉价优越感。第二是国防价值。失去西藏，就等于在中国软腹部打进个巨大的楔子。少数轻骑自高原上飞将军自重宵入，便能轻而易举地截断河西走廊，断绝内地和新疆的交通线。西藏独立后形成的战略势态很像外蒙独立。70 年代中国要和老大哥摊牌，让小芦忧心如捣。谁都看得出来，倘老修在外蒙的快速装甲部队倾巢而出，截断内地和东北、内地和西北的联络线（那是中国最细的两个脖子，割断毫不费力），便是个“倚天抽宝剑，把汝截为三截”的惨不忍睹的模样。

但西藏的价值也就仅此而已。那地方和月球表面一样荒凉，毫无资源，即使有未探明资源也毫无经济价值。又没有移民价值。在这点上，它和新疆还不同。新疆第一是有许多汉族移民在彼，一个负责的政治家就不能不考虑这些人的命运。第二是那儿的油田将在未来中国的国民经济中起到重大作用。因此，处理这两个地区的策略便不能雷同。我的建议是，迅速放西藏自治，只留驻军。这样既保留了它的国防价值，又免去了后患和其他麻烦。但新疆就必须抓得很死，先把那些油田私有化了，变成不会因独立而丧失的财产。再人为搞富那个地区，以此冲消境外极端伊斯兰教徒的暴力倾向影响。当民族和解实现后，再逐步放权实行自治。从先后顺序而言，西藏应该是最先获得自治权的地域，而新疆应该是最后，因为那儿是最可能爆发民族间武装冲突的火药桶。

基本原则说完了，下面试着逐条回答你的问题：

<<1 何谓“西藏”？

老芦强调“达赖喇嘛是我最佩服的国际上最睿智的政治家，不是一个不顾现实不讲道理的人”。依我看，在西藏的版图划分上，达赖喇嘛就很不讲道理。达赖喇嘛在“五点和平计划”中指出，“与中国结盟的西藏必须是将中国所有藏区统一在一起的大西藏”。所谓大西藏，不但包括今天的西藏自治区，还包括整个青海，半个四川，半个甘肃，四分之一个云南以及新疆自

治区的南部，面积将近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比西藏自治区面积大了一倍，不但涵盖了全部藏人聚集区，还包括了大面积的非藏区，有 17 个非藏民族在那里居住，甚至连自古以来就是属于汉人的河西走廊也被划入了大西藏的范围。不知道达赖喇嘛这么划分地盘的“道理”何在？

想当初达赖喇嘛出逃的时候，他的势力范围也不过就是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即便是清朝和民国时期，达赖喇嘛的行政管辖范围也没有超出卫藏），如今他两手空空回来，却狮子大开口，要的地盘比原先大了一倍，中共对达赖不理不睬当然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要想让中共心甘情愿地把达赖喇嘛迎接回来，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版图划分上的巨大分歧。这个问题老芦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老实讲，我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达赖喇嘛有更大的责任，这正是他“顾事实，讲道理”的一次机会。>>

愚以为，达赖那狮子大开口认不得真。这正如 70 年代中苏吵边界问题时中方提出要恢复到尼布楚条约划定的边界似的，不过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一种谈判策略而已。中方的应对策略可以很简单：亮出不容谈判的底线来：退回到 17 条协议时的状况，请你不费一枪一弹回来再作西藏王 (可不是地藏王)。西藏的边界就是现有的那个，你干便干，不干拉倒，请你继续去作流亡政府首脑。我敢担保，这条件开出去，他老人家一定会跑得脚后跟朝前！中国和他谈判从来就没提出过这种令人无法拒绝的优厚条件，你要让人家通情达理又有什么可能？如果达赖不是那么睿智，岂会获得诺贝尔奖？莫非那玩意真是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诡计？倘如此，人家为什么不发给民运人士？我有幸看过几次电视采访，对此人的智慧、风度、公关本事佩服到五体投地。无论国外国内，我还真没见过谁可以与之比肩。

<<2 如何自治？

所谓自治，无非就是想用香港模式来解决西藏问题。不过，香港的“一国两制”能够实行，一个关键前提是必须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实现完全的隔离，只有隔离才能“两制”，否则就是一国一制了。隔离的重要，在 59 年西藏叛乱中显露无疑。早在 1951 年中共进军西藏以后，曾在西藏实行过事实上的“一国两制”（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和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由于在西藏和青海、四川之间没有实现严格的隔离，导致青海、四川的藏族贵族首先叛乱，最后事情闹到拉萨，导致了 1959 年事件。

鉴于这一教训，中共在 1997 年收回香港以后，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实行了严厉的隔离政策（主要是控制大陆人去香港），很多大陆人因而感慨香港回归以后更难进入了。

然而，香港地理上是一个小岛，隔离起来并不难，但要想在方圆 120 万平方公里、遍布高山雪原的青藏高原实现隔离又谈何容易？不事先隔离就“一国两制”，完全有可能重蹈 1959 年的覆辙。>>

愚以为，先生受王力雄那本书影响太深。那书说的当然不错，但现在时移世易，早不再是当初那情形了。当时中共在西藏周边的藏族地区搞“民主改革”，解放农奴，逼反了那些地区，终于波及到西藏去。但现在中共根本没必要再在那些地方搞什么运动。如果西藏高度自治，根本也用不着隔离。因为西藏是经济落后地区，不是香港那种发达地区。到时只会有想发财的西藏人往外逃，哪怕您跪下去给人家磕头，恐怕也没哪个汉人愿意偷渡进去。所以边界完全可以敞开，任人自由来往。藏民如想往拉萨或日喀则朝圣只管请便，愿意永久移居该地的更不反对。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隔离必要，先生说呢？

<<3 藏人的内斗如何解决？

正如王力雄、徐明旭等人指出的那样，“藏人”早就不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而是有彼此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藏人。如今西藏的中共各级干部中藏人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人基本上不学无术，且早已经被流亡藏人看作“藏奸”。这些人别看正经本事没有，搞阶级斗争倒是十足的内行，再加上人员众多（保守估计 6 万多人，再加上家属应在二、三十万之众），西藏“自治”后，这些人一定会与回到西藏的流亡政府发生对抗。很明显，西藏一旦独立或者高度自治，首先倒霉的肯定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但有捍卫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的动机，也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现成的组织体系，完全有条件有可能与西藏民主政府作对抗。

这样，西藏将永无宁日。>>

我看这也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大事，把这些人撤回内地来就完了。人数毕竟不是很多，完全可以在内地安插。愿意留下者，则请他们去和达赖政府谈判，以个人身份申请工作。一个跨国公司要倒闭都可以大量裁员，我看不出为什么要让这区区少数人变成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

<<4 西藏的财政供养一笔勾销就行了吗？

老芦说西藏高度自治后，应该“取消巨额财政补贴”，并且“如果以后西藏出现经济困难，须公开向中央政府申请资助，再由中央明令颁布援助数额”。但问题是，西藏对内地的经济依赖性是相当大的，离开了财政援助，现在的西藏社会恐怕连几个月的

运转都很困难。所以，即便在西藏实现了“高度自治”，中共也有大量的手段可以对西藏政府施加影响。更何况，拨到西藏的钱都是内地百姓的血汗钱，中共当然有权利过问这笔钱的用处，不要说像中共这样一个独裁政权，即便将来实现了民主化，选民提出“监督我们的血汗钱的去向”的要求也并不过分。一个经济上不能自主的地区，很难实现真正的自治。

更何况，西藏现在成了中共的大包袱，对藏援助早已超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承受范围。事实上，对藏援助很大比例都是以各个地方“对口援建”的形式搞的（今天广东给弄个医院，明天福建给盖个工厂什么的），老芦提出的仅仅通过联邦政府预算来解决援藏问题，恐怕不太现实。

老芦豁达开明的民族观在下十分佩服，不过，正是一些看起来很琐碎的现实问题阻碍了民族问题的解决。也许还是王力雄说的对，西藏问题“无解”。>>

“一个经济上不能自主的地区，很难实现真正的自治。”这话很有道理，这也是西藏问题的核心所在。不过，西藏以前确实是自治地区，这似乎也是事实。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共接管西藏后，如同奉养双亲似地把藏人养了起来，惯出了他们比较现代的高生活水准。“由奢入俭难”，西藏高度自治后，这势必构成达赖政府最大的难题。

达赖其实对此心中也有数，他的解决方案似乎是靠佛教宣传使人民回归清心寡欲、安贫知足的精神状态中，由此来获得政权的稳定性。这玩意是否解决问题，我非常怀疑。不过，我仍然觉得我的方略基本是可行的。那是否“真正自治”，其实并不是什么“经济上自给自足”的问题，而是不要去管人家内部事务。所以，我主张放手让达赖接管，不管他怎么踢天弄井都是他的事，咱们管不着。如果经济大幅度跌落，人民不满，让他去尝尝那焦头烂额的滋味，也让老百姓知道内地各族人民以前对他们的援助。如果出现骚乱，除非达赖政府主动邀请，否则中央决不派兵弹压。等到他们实在吃不住劲了，再出来收拾残局，恢复援助，但除了不准官员贪污外，人家爱怎么用那钱是人家的内政问题。在这上面的处理原则，应该仿照当初共党国家之间的“兄弟援助”原则，不能去以任何形式“对西藏政府施加影响”。唯一例外的是国防和外交，这是联邦政府的权责，地方政府无权置喙。

联邦政府能否承担起西藏的经济负担来倒确实是个大问题。我觉得，解决的方法是，可以放手让西藏人去作国际丐帮。达赖是国际公关第一高手，我深信他有本事要到足够的钱来维持西藏运转。如果要不到，中央给了一定资助后，可以让他到内地沿门托钵，要得到要不到那是他的事，咱们不必太为人家操心，说到底，是他要自治，求仁得仁又何怨？难道还能赖到汉族头上来不成？不管怎么说，应该相信人家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人家还不是活了下来。

总而言之。西藏问题必须解决，必须迅速解决，必须在达赖在世时果断解决。“西藏问题无解说”只是掩盖自己缺乏政治智慧的遁词而已。解决西藏问题不但有助于中国实现民族和解和长期的安定团结，而且能极大地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改善中外关系。须知鬼子们一百个中有一百零零点一个站在达赖那边，谴责中国“侵略者”。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定能极大地消除中国那个“共产恶魔”的传统形象。

关于民族问题一系列文字之补遗

芦笛

最近比较忙，文章现写现贴，来不及从容斟酌，过后才想起来忘记了若干重要的内容，在此补充一下。

（一）关于台湾问题

我在《再探维护祖国统一之道》中建议中共当局容许台湾加入联合国并与其他国家建交时，说的是“应允许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一条根本没有现实可能，应该改为“中共当局应容许台湾以‘中国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并和其他国家建交”。

此外，我觉得在和大陆的谈判中，台湾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名为“中华民国”作为统一的前提，提出来将大陆的军，我估计大陆虽然号称“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条件都可以谈”，但绝对不会同意这一条，因为这个口子一开，就等于彻底否定了中共在已故魁首毛泽东领导下的长达半世纪的革命其实是叛乱活动。但这个要求在台湾来说完全是合理的，中共也无法从法理上驳倒：台湾是日本人交还给中华民国的，没还给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你既然要把台湾收回去，最起码的一条就是得证明你是中华民国那物主。如果你连个名义都不肯改，还怎么让世人相信你有实质上的诚意？

此招不过是教台湾有效地推搪大陆的统一攻势罢了。之所以献此策，是我觉得台湾应取的策略是个“拖”字诀，这最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拖个几十年，如果大陆让共党腐败政权、民族分离主义者和“民主”革命家们联手弄垮了，碎成补不起来的七八十片，则台湾大可安全地独立。如果眼下大陆的腐败得到有效整治，改革经受了民族分离主义者和“民主”革命家们的两面夹击，国家转危为安，则大陆将变成更繁荣、更富裕的现代民主国家。到那时国民普遍具有了现代文明意识，一定会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到时是统是独，可以由台民投票决定。我相信，那时台民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又消除了对专制政体的恐惧，很可能会选择加入中国这条路，就像如今的欧盟成员国似的。即使人家不愿加入，只要两岸结成了实质性的良好经济关系，台湾便独立又何妨？

一、关于“一国两制”和隔离问题

这个问题昨天已经谈了，但不完全。现在西藏境内和周边地区都是一个制度，即处在血腥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当年的封建领主已经基本化作了白骨，而农奴制再也不可恢复。所以，如果达赖重作西藏王，他面对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西藏。如果他真是像其公共形像展现出来的那个现实主义者，则他很不可能去复辟昔日的制度而带来社会大混乱。其实他本人对西方传媒一直说的是一旦重新当政，一定要实行民主制度。这当然可以看成是他的宣传攻势，不过我觉得流亡政府人数稀少，长期脱离实际政权机构，缺乏实际施政才能，他们的影响主要是宗教上的感召力，而不是世俗的力量。要靠那几个残兵败将，在西藏全面“反攻倒算”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达赖返藏，最大的可能是率由旧章，不可能改变根本的社会结构。

这当然不是说达赖不会改变西藏人的精神面貌。据达赖自己阐述的政纲，未来西藏人将保持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除了点旅游业外不发展什么工业。这就是说，“现代化”和西藏没有什么缘份，藏民将在宗教追求而不是物质追求中获得愉悦。我个人觉得这当然是很明智的纲领，因为西藏确实不具备现代化条件。但要在万丈红尘环绕之中营造这种“香格里拉”，恐

怕比毛建立“理想国”还困难。当然，西藏的好处是它天生的地理隔绝。或许达赖能成功也未可知。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１９５９年的情况不会再现。西藏和周边地区现在的社会结构没有多大区别，在达赖重返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也不会有什么高反差。以后随着时代发展，可能出现的差别只是富裕程度上的，而这并不会引起周边地区或西藏内部的骚乱，只会把某些宗教信心不够坚定，无法安贫守苦的藏民从西藏吸引出来。达赖可能会对此不高兴，但这并非内地或中央政府的错，就象福建农民可着劲地往国外跑似的，就连中共当局都没脸去赖帝国主义。

即使如此，在迎回达赖前，中央政府必须充分考虑到未来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关系问题。一定要在条约中明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治理范围。居住在此范围之外的地区（如青海、四川、云南）的藏民可以以自治县、自治州的等级实行自治，可以奉达赖为宗教领袖，但地域不归西藏世俗的喀厦政府治理。我看不出这种安排会为未来播下什么祸种。

这“一国两制”其实是我党发明的一个混乱无比的用语。我的意思是，所有的民族地区都实行民族自治，只是实施起来有先后之别，西藏不过是个先行试点而已（这是１７条协议赋予西藏的特殊地位，别的民族地区没有，所以不能抱怨）。因此不但西藏实行自治，西藏周边的藏族聚居地区也实行自治，只是与西藏在行政上没有统辖关系。如果真做到这一点，就不会有什么１９５９年间的制度差别，足以引爆叛乱。所谓民族自治，就是让各民族自己去管理自己，人家爱怎么过就怎么过，爱实行什么制度实行什么制度，爱走资也好，爱安贫守穷也好，都是人家自己的事，外人无权强暴。如果真做到了这一点，就是长治久安的基础。

其实 whopper_junior 先生没意识到，香港的问题不光是个一国两制的问题。论经济制度，香港和大陆现在究竟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除了发达程度外，最主要的是人家是先进的法治地区，现在又在尝试实行民主。大陆隔离香港，除了杜绝那儿可能散发出来的不利的政治影响外，主要是怕全国人民一窝蜂跑那儿去淘金，把那臭岛压沉了，如此而已。类似的问题在西藏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民族心态的根本差别，达赖根本不可能变成汉人的活佛。中共没什么可担心的。

二、关于藏共干问题

徐明旭的有关文章我看过，我始终觉得他的主要论点经不住推敲。就算藏共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盘根错结的势力，总大不过苏共、蒙共、越共去吧？但苏联和外蒙都成功地实行了社会转型，并没见到既得利益集团起来暴力反抗。就连越南也这样，现在该国的政策和黎笋、范文同当政时截然不同。为什么在西藏就会变成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其实对国内的情况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就像我在小说《虎子的天空》中写的，不知不觉之间，大款们不再是当年的大款，“公仆”也不再是当年的“公仆”，整个社会上层都在悄悄地更新换代。如同内地一样，１９５９年以后培养起来的老藏共干不是退休便是进了西藏七宝山，现在当家的是一夥中央民族学院培养出来的少壮派。那些人的汉文水平比网上汉族愤青

水平还高，头脑灵活，具有现代意识，不是什么冥顽不灵的文盲老共干，很容易就能和达赖手下那些精通英语、具有广泛的深入的世界知识的少壮派尿进一把夜壶里去。如果中共要从西藏全面撤退，势必要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达赖政府那点单薄的人力，又是人地两生，有的第三代连藏语都不会说，根本就不可能全面顺利接管。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只是为了平稳交接，达赖也会留用大量的旧政府人员，这就免除了藏共干的后顾之忧。现今的人都是实用主义者，到时忙着拍新上司的马屁都还来不及，哪里会去舍命打内战？

三、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

如同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一样，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是我党，而这就是令人最丧气的。要说愚昧，共党才是真正的惊天动地的愚昧。我敢断言：老芦这些方策完全是白写，绝对不会被共党采用，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胆识。

解决西藏问题和其他民族地区问题的关键措施是实行民族自治，而这恰恰是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一条。你既然允许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当然接下来也就是汉族自己治理自己，这就意味着共党必须逐步还政于民。这种“亡党亡国”的事，哪个党魁敢拍板？

另外一个问题是宗教权威问题。共党之所以疯狂迫害法轮功，说到底是它的毛共残留性质使然。共党和历史上有过的专制政权不同的地方，是它本质上是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决不容许任何其他意识形态上的权威存在。因此，为了国际公关，它不得不容许天主教存在，但决不容许教会和梵帝冈有任何联系。不难想见，如果达赖真的返藏，势必要形成全藏人民以及周边地区的藏民的膜拜对象，成了独立于中共世俗权威之外的一个精神领袖。作为全国人民当仁不让的“教父”，中共最恨的就是这种事，而这正是李老师撞在枪口上的原因。他们既然连对个吹小号出身的同志都会动如此干戈，兴许大风浪，又怎么能容得达赖隐然和北京分庭抗礼？

所以，我早在以前的文章中一再说过，中华帝国一定会崩解，神州大地一定会变成南斯拉夫式的修罗场。这不是说中国问题“无解”，也不是没人能想出解决方案来，而是说朝野两党，无论是当政的中共，还是民族分裂主义者或“民主”革命家们，都没那个眼力看出迫在眉睫的大难，更没那个胆识去解决那一系列的难题。

（三）《写给出尘公子》之补遗

昨天忘了跟出家恶少说最重要的几句话：

第一，武力不可恃，前苏联的崩溃就是证明，那可不是什么美帝弄垮的。“你要战，便作战”之类的胡说在少数民族看来，完全是武力恫吓，只能加速各民族的离心倾向。

第二，我和老马以及你在网上蒙受污辱，实质和那兰性德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兄弟完全不同。我们是被同族污辱，那污辱虽然恶劣到极点，但不是针对整个种族而来的。那兰性德先生蒙受的污辱则完全不同，是针对人家整个民族的。要明白这一点，光看他附上的ＲＥ用无比下流的话语侮辱整个蒙族的跟帖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凡有起码血性的人都会作出强烈反弹，针锋相对地侮辱整个汉族。后者是果，前者是因，你得把这因果关系弄清楚再出来代表汉族挑战，好不好？

第三，我说过，民族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敏感的问题。对少数民族兄弟不能像对其他网友一样想骂就骂（这倒不是指控你骂人，只是泛泛而谈）。如果不能作“换位思考”，最好还是免开尊口，否则请先去边疆安家落户。的确，如果你在边疆，宣战的气魄大概就不会那么足。

第四，主办奸坛的内奸和在这儿发言的人是两回事，奸坛的“中立”宗旨和发言者的政治倾向性也是两回事。无论是奸坛的内奸，还是发言者，都不是铁板一块，都是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的，宽容度也因人而异。但你在“宣战大诏”中把这些全混了起来，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在奸坛发言的人全是厚道君子似的，这完全不是事实。不用说那兰性德先生遭受本坛许多发言者的围攻，就连我的“扫荡”也不见容于此坛绝大多数论者。以一种主张是否受到欢迎来决定这种主张的正误，当然是我党的惯用手段，但在我看来不过是倚多为胜的 mob 心态而已。

第四，我昨天的帖子中，因为一时激动，说了些过头话。的确，确有个别斑竹在我和刘国凯、高寒的辩论或争执中拉了偏架，但这是可以理解的个人行为，因为一个具有自己政见取向的人在履行斑竹职务时，确实很难做到摆脱自己的成见而不偏不倚地执法。我对此表示理解，并声明：只要我还呆在网上，就不会作出对不起奸坛的事来，决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把这儿的读者和写手们吸引过去（如果我真这么做，最先跟过去的就是那些骂我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强迫性的“芦迷”）。我只会保持现在的作法，改名换姓跑到国内去玩文化。

（四）简答老枭

老枭，你那批评我的帖子，我一目十行地看了，感觉是你这人太天真，根本不知道所谓“民运”人士们是些什么东西，大概那是因为你在国内不了解情况吧。我懒得跟你细说这些无聊的事。只想告诉你，许多所谓“民运”人士，跟民主毫无关系，他们关心的也根本不是中国的前途，更不是在中国实现民主。这些人不过是党内或党外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因为个人

野心无法实现，不得已亡命天涯，打出“民主”的幌子来招摇撞骗而已。论本质，他们和３０、４０年代争取“民主”的毛共毫无差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毛共不管怎么说还有人家的真诚信仰，而这些新时代的革命家关心的不过是怎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搞乱中国，在乱中夺权”而已。

要看出这点来毫不作难，只需看看他们跑到海外来闹到现在，究竟推出过个什么样的施政纲领来，详细说明他们掌权后将实行何种经济制度，可行性如何，怎样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实施民族自治的具体方案和步骤是什么，怎样实现并维护祖国统一，等等。请问你见过有谁写过像老芦那种具体可行、切中时弊的玩意么？前些天我公开向高寒先生提出挑战，请他和我比赛拿出治国方略来，他的回应竟然是，我不配和他比赛抽象思维！光从这个回答你就能看出这些人究竟是关心个人的声名还是国家的命运。在他看来，我这个挑战不是逼着他们去真正关心国家命运，而是在几百个读者面前比赛个人的智力！你能理解这些人的心态么？说到底，这些人缺乏的不是智力，而是对改造中国的兴趣。他们真正热衷的是“彼可取而代之”，把共党推翻，自己上去作威作福。如此而已。

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成为逼迫中共改革的有效的党外压力集团。相反，在客观效应上，他们起到的作用是和民族分离主义者们从左右两个方面夹击中共，为已经是步履维艰的改革事业添乱。如果中共真的让这些人弄垮了，那么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的不是什么民主乐园，而是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大灾难，那时条条江河都将流淌着鲜血，座座山岗都会化成焦炭，而你老枭恐怕也要成了东海浮尸，再没那本事吟诗作对，炒股泡妞。那时你倒地之前，恐怕脑海里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是：“唉！那老芦，当初为什么不狠劲捏那些软柿子！”

这些话当然不是把所有的民运人士一网打尽，说的主要是伪民运人士，特别是那些暴力革命家们。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早就多次解释过“‘扫荡’伪民运”的真实涵义，这里不想再重复。我也不想再和你谈论这些无聊的事，如果我以后忍不住又来此地谈政治的话，那咱俩各练各的摊，老死不相往来，好不好？（这可不是说不和你通信，你别弄错了。）

一、关于迎回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可行性

谢谢先生提供的详细信息，补充了我的知识缺憾。其实王力雄的书我看过，而且非常欣赏，只是没像先生看得那么细罢了。看了先生提供的信息，我的疑问是：中共真的按我的那个建议作过试探么？先生那“事实上，中共和达赖的巨大分歧，决不是谈判技巧的缺乏造成的”的断然结论，似乎完全基于王的这段话：

“这本是常识性的道理，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达赖喇嘛肯定非常明白。但限制他不能采取这种现实谋略和灵活手段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西藏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还有相当比例来自安多和康区。五十年代对中共的武装反抗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反抗战士和百姓为

了躲避中共军队的围剿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 45 个议席，其中 30 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地区分配的，每个地区 10 个议席 ，那么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哪怕是出于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在议会难以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无论从公正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利益出发，皆说不过去。仅此一点，就决定了达赖喇嘛与北京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

但这段话不过是推测罢了，第一没有给出谈判事实依据，至少是没有介绍谈判的过程和导致流产的症结，更没有证实中共曾主动提出过我说的方案，只是根据流亡者的组成推测达赖不会采取“这种现实谋略和灵活手段”而已。第二是没有介绍达赖政府的民主程度究竟如何，亦即达赖本人是否可以不顾部下反对，作出决定。

这两个问题都构成了论断的严重缺陷。先说第一条，如果中共不松这个口，达赖当然不会这么提出来，因为如果提出来而又被中共拒绝，则达赖除了碰一鼻子灰后还要得罪他生死相依的部下，谁会干这种蠢事？相反，如果达赖确知中共中央已经下定决心退回到 17 条协议去，则那诱惑应该是很大的。毕竟，流亡在国外，跟回去重享丧失了的那一切完全是两回事（达赖在西藏的夏宫非常漂亮，和他在印度的居所有天地之别）。

就算中共主动提出此案会被达赖拒绝，那总也起到了一个诱饵的作用。这诱饵从此潜伏在他的意识深处，当他在国外不如意的时刻就会产生一种动摇心理，把祖国当成一种他实在混不下去时的后路(凡是在海外混过的人恐怕都有这种心理)。这种心理在潜意识中作用到一定程度就会起质的变化。就算达不到这种程度，总比断绝了他的后路，让他死心塌地地转向独立好些，是不是？更不用说这可能在卫藏人和安多、康巴人中间造成一种分歧，增加主张回归的人的势力了。

第二条也有待推敲。据我所知，达赖对部下的控制力不但是世俗的，更是一种宗教上的，大概根本不能与民主国家首脑类比，或许和战前的日本天皇倒有些相似。如果不是达赖力排众议，他那个流亡政府早就宣布独立了。因此，如果达赖同意此案，手下恐怕也无法推翻，而且达赖可以把这些人安排到西藏新政府里去，并不必抛弃他们。这些人早就离开老家，老一代死的已经差不多了，新生代整个西化，和故土没多少感情，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非要坚持回到安、康去。

所以，我认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达赖会拒绝此案、进而否定此案可行性，未免失之武断。

退一步说，就算此案不可行，仍然可以用分而治之的方法处理，即把安多和康区分开，仿照卫藏的方案实行自治，只是在行政区划上各不相属罢了。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二、关于藏族共干问题

我认为，先生之论有几个问题：

第一是低估了少数民族干部的水平。我本人曾经遇到过一位藏族市长，该同志很年轻，口才极佳，在讲话中随口引用汉语成语。而这并不是个例，如今提拔起来的那些少数民族干部大多如此。总之，不要小看人家少数民族。

第二是低估了少数民族干部的离心倾向，这点藏獒先生已经指出了。在当今中国，无论是汉族共干还是少数民族共干，不但无任何人相信共产主义，而且所有的人都对时局满腹怨言，骂中共骂得比海外的人还厉害。我敢说一句，恐怕大多数少数民族干部都有离心倾向。在老一代少数民族干部眼中，如今的中共背叛了老毛象征的全民族事业(这一点那兰性德先生已经讲了)，而新一代干部则向往西方，看不上中国如今的腐败和落后。藏族干部当然也不例外。

第三是把人均收入当成了实际个人收入。藏干当然贪污，但恐怕那援助的大头还是花在各种建设措施上。我并不认为少数民族干部的贪污要比汉族的严重。在内地看一眼就知道，共干并没有把所有的社会财富都席卷入私囊。边疆地区也如此，这些年新疆和西藏都建起了许多新建筑。

第四，你那“横、纵比”说让我想起 80 年代的小温侯温元凯(玩笑)，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逻辑缺陷。跟香港比是针对你那“一国两制”说的，指出两地的不同，所以无需隔离。跟苏联、蒙、越比是针对你那“藏共干必然掀起内战说”而言的，比较对象恰好都具有可比性，没有任何可见的逻辑缺陷。

第五，你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造反是需要勇气的，而贪污犯只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要让他们像当年那些安多、康巴勇士们揭竿而起，岂非笑谈？其实大多数人都是“风行草偃”，真正不怕死的勇士比例很低。达赖没来这些人当然反对改变现状，但如果达赖入藏真成了定局，恐怕他们是欢迎的第一批，忙着去组织“维持会”都来不及，岂会玩命造反？当然，这不是说他们不会结成派系作内斗，但那并不是扯旗造反。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因此而废除一个合理方案。

第六，退一万步说，如果这些人真的成了极大阻力，把他们撤回内地不就完了？再说，真要是爆发内战，共军在那儿是吃素的？这种类似南斯拉夫的维和行动，不但会受到达赖欢迎，而且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

总而言之，我读过作家徐明旭的一系列文章，而且还在 80 年代读过他的小说〈调动〉(他就是因为那短篇小说给流放到西藏去的。除了那篇粗糙的小故事，我没看过该作家其他文学作品)，并不觉得他和王力雄是一个水准。

三、中国没有民族问题？

先生说：

<<我一直认为中国没有民族问题，只有发展问题。在此我呼吁：不要把新疆、西藏、内蒙的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那样非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最终更会危及少数民族的利益。把少数民族问题归结为发展问题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经济力量会更强大，中国也必将最终走向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少数民族也必将与全体中国人民一起享受到富裕的生活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但是，如果把少数民族问题“民族化”并国际化，就会严重影响中国民主力量的发言权，中共的专制暴政也会更加拥有市场，因为民族问题的解决是无法通过发展经济或者成立一个新的政权来解决的。君不见英国、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发达的民主国家照样遭受民族问题的困扰吗？另一方面，倒是中共对于少数民族的强硬政策（王震之对于新疆，张国华之对于西藏）更能说服民众“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一句话，如果我们真心想让西藏、新疆、内蒙各族兄弟姐妹过上好日子，就别再什么“独立”，“自治”的瞎折腾了。>>

恕我直言，这里陷入极度逻辑混乱，先是说“把少数民族问题归结为发展问题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接着又说“民族问题的解决是无法通过发展经济或者成立一个新的政权来解决的

”。这互相矛盾的话竟然出现在同一段落中，实在让人遗憾。

其实先生是想说：“不把民族问题当成个问题，则它就不再是问题”。这种思考方式，在下期期不敢同意。如果中国真没有民族问题，那前几年新疆伊宁暴乱、西藏宣布戒严是什么问题？我们又何必在这儿谈据说是“无解”的西藏问题？莫非西藏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发展问题？经济发展起来了，不是问题的民族问题也就冰消瓦解了？“君不见英国、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发达的民主国家照样遭受民族问题的困扰吗？”

坦率地说，先生这种否认现实存在的态度，和先生批评的中共“击鼓传花”、只要炸弹别在我手中炸了就行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我看没有什么两样，而先生居然说出“中共对于少数民族的强硬政策（王震之对于新疆，张国华之对于西藏）更能说服民众‘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这种话来，实在让我失望到极点。我坚决反对以屠民来巩固国家的铁血政策，不光是它践踏起码的人类最起码的道义与良知，而且后患无穷。如果没有王、张辈作下的那些孽，今天民族问题决不会变得这么复杂。

其实我看得出来，先生此论受王力雄影响太深。王在那书中解释藏民在“平叛”后对中共特别是毛的服膺态度时说，那其实是对强有力者的一种崇拜。此话当然有道理，但不能归纳成个永远成立的真理。最明显的问题是，那“强有力者”并不能永远强有力下去，而这就是今日少数民族纷纷显示离心倾向的原因。我写的一系列文章都是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的，可惜到现在悟者寥廖，竟然看不出中共的枪杆子不会永远强有力下去，而一旦不灵之日，就是“不是民族问题”的问题变成大问题之时。

先生最后的结论是：

“中国需要的是眼光现实的实干家，是像老朱那样的低着脑袋干活的人，而不是坐而论道，慧眼独具，能给中国朝野众多糊涂蛋们指出一条明道的仙人道长。如果一定需要这么一个人，那么我宁可打赌他会诞生在国内。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关注王力雄等人的言论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只有像王力雄这样的长期在国内生活，又不怕做共产党的大牢的人，才最终有可能提出真正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像我们这些海外华人隔着个太平洋偶尔到网上写点东西发发牢骚，恕我直言，戏不大。”

此话当然有理。不过我觉得，如果改为“中国需要的是建设家、改革家、思想家，而不是革命家、破坏家、煽动家、捣乱家”就更准确，至于在国内国外倒不是什么根本的区别。没有根据说在国外的人就不能为中国的建设和改革献计献策，也不能说国内的思考者想出来的路子就一定可行，而国外的思考者想出来的全是 JUNK。更不能说国外的思潮不会在国内起到影响。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俄国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从国外输入的思潮引发的。我对王力雄先生非常钦服，不过他的<黄祸>所作的预言基本没有兑现，而他的 <关于达赖喇嘛的小说提纲>更是严重脱离现实。当然，不能如此苛求国内的论者，这里有个视角和视野的问题，而这正是国外论者的优势所在。

再次谢谢先生回应。